

费孝通全集

第十七卷
(2000-2004)



费孝通全集

第十七卷
(2000-2004)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全集·第17卷,2000~2004/费孝通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

ISBN 978-7-204-09796-8

I. 费… II. 费… III. 费孝通(1910~2005)—全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228号

费孝通全集

费孝通 著

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占英 王继雄

责任校对 县翔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92

字数 7025千字

版次 2009年10月第一版

印次 201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书号 ISBN 978-7-204-09796-8/C·215

定价 880.00元(全20卷)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21 世纪的费孝通

本卷说明

本卷收录了作者2000年至2004年间所撰写的文章。进入耄耋之年的作者仍未放松对社会诸多问题的关注和思考，而且其视野更广阔，见地更深刻。在继续进行学术考察、探索中国社会的发展问题的同时，对自己六十多年的学术工作进行了一些回顾性的总结，《我的思路框架》、《暮年漫谈》就是其中著名的篇章。《补课笔记》则是作者从其老师派克一生的致学经历入手，研究他的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重温老师的基础理论的直接成果。此文后被收入三联书店出版的《师承·补课·治学》一书中。

此外，在这个时期，作者还继续深入思考“文化自觉”问题，撰写了《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与前瞻》、《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等文章，积极倡导世界各种文化多元共存、取长补短、联手发展，共同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本卷的文章均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在编校上，除对个别明显的排印上的错失予以纠正外，其余一律存其旧貌。

目 录

“兴边富民行动”好	(1)
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	(4)
补课札记	(7)
决心补课	(7)
派克来华	(10)
派克的早年	(14)
人生道路的选择	(17)
留学欧洲	(21)
深入社会基层	(26)
一段插话	(31)
芝加哥大学及其社会学系	(34)
派克进入社会学阵地	(38)
派克和汤麦史两人的结合	(42)
从探险者成为拓荒者	(46)
派克老师在备课	(49)
欧战期间的派克老师	(54)
派克老师走上讲台	(60)
奠定社会学成为一门科学	(64)
众口交誉的老师	(70)
再说《引论》	(77)
另一本老师的杰作	(80)
未完成的种族关系研究	(83)

跨越太平洋	(89)
人生苦短,探索未已	(94)
后记	(101)
要对时代变化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	(109)
关于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些思考	(115)
关于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再思考	(121)
积极拥护、支持西部开发大战略	(129)
论西部开发中的文化产业	(135)
谈谈社会学的教材建设	(143)
新世纪 新问题 新挑战	(150)
创建一个和而不同的全球社会	(163)
祝愿杨凌人取得好成绩	(177)
故地重游多新见	(181)
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对文化的思考	(190)
新形势 新探索	(203)
知识分子的讲台	(207)
入盟五十六年	(210)
关于“多元化的西部文化”和“文化生态失衡问题” 的谈话	(214)
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232)
再谈中国古代玉器和传统文化	(236)
祝愿党的生日	(243)
人类学与二十一世纪	(247)
民族生存与发展	(261)
进入二十一世纪时的回顾和前瞻	(270)
获益终生的一段经历	(284)
《人类学书系》总序	(288)
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	(291)

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	(302)
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回顾与前瞻	(314)
老话重提	(326)
“补课”问题应引起知识界的注意	(328)
《社会学精品原版教材系列》序言	(331)
哲学社会科学的春天	(336)
《乡镇区的当代变迁——苏南七都》序	(341)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	(343)
回眸七十年	(353)
期待巨龙腾飞时	(358)
继往开来,建设 21 世纪中国的社会学	(361)
梦想成了事实	(367)
赠友人	(369)
家乡小城镇大发展的二十年	(370)
发展如蜕变,说城镇与区域经济	(394)
“非典”的社会学反思	(415)
大庆行	(419)
又一次访问定西	(426)
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	(438)
暮年漫谈	(466)
老来还是要再向前看	(496)
《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序言	(500)
在“纪念费孝通教授《小城镇 大问题》发表 20 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	(504)
给“第八届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研讨会的信	(507)
对文化的历史性和社会性的思考	(510)
我的思路框架	(528)
怀念李定同志	(532)

给全国博士后“中国社会运行与变迁”

- 学术研讨会的信 (534)
-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 (536)

“兴边富民行动”好^①

春节前，国家民委的同志来看我，邀我参加“兴边富民行动”新闻发布会，并就担任领导小组的名誉顾问，征求我的意见。感谢同志们的关心和信任。耄耋之年，动手做事已经力不从心，却很乐意为后来人敲边鼓、跑龙套。所以，名衔，我领受，由于其他原因，没有能够到会看望久违了的第一线的民族工作的同志们。请代问同志们新春好！

现在，西部大开发这个世纪大题目已立起来了。各地、各部门竞相抓紧研究怎样切题、破题，力争拿出一流的佳作。中央提出总体构想之后，需要有若干的专题规划，以有目标、分阶段地逐步推进和实施。我看，“兴边富民”是可以起到这种作用的专项规划和配套工程。兴边富民，是全国的事情，但首先是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事情。国家民委发起这项行动是应该、也是适宜的，于国于民都做了件有意义和有益的事。

中国形成多民族统一国家已有 2000 多年了。在 2000 多年的时间里，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天下未乱边先乱，天下已定边未定。观边疆治乱兴衰，可知国家统一与边疆的稳定与否有着密切的联系。古代称边疆作“四裔”，称边疆少数民族作“四夷”。总的看，中国历代王朝对边疆和边疆少数民族多采用羁縻怀柔政策，“因俗而治”，“一仍其旧”。就是汉、唐、元、清强盛时期，也都无力实行直接统治，无法做到全国政令

① 本文是作者为《中国西部概览》丛书（民族出版社）所写的总序。

统一。根本原因在于他们实行的是民族压迫制度，采取的是民族歧视政策。直到解放初期，边疆少数民族仍然保存着各种各样的政治制度和各种各样的社会经济形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了一场社会革命，从而引导边疆各民族共同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帮助边疆地区发展经济文化，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成就。

人类跨入新的千年、新的世纪，中国正在走向空前的大统一，中华民族正在实现伟大的复兴。在我们朝着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着力提高国际竞争力和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时候，加快边境地区的发展，实现富民、兴边、强国、睦邻，不仅十分重要、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

“兴边富民行动”应当抓住两个中心词做文章。一个是“边”。我国陆地边境的绝大部分地区，都在少数民族地区。“边”有时也是资源，是优势。在海上交通兴起之前的1000多年里，陆路交通发挥了主导作用，正是通过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把亚欧大陆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紧紧地连在了一起。我国边疆各少数民族都为促进中西交流和创造灿烂的中华文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实践表明，只有开放，才能活边，最终才能兴边。当前，应当更加重视发挥少数民族在对外开放中的优势，通过沿边的大开放，促进边疆的大开发，实现大发展。必须看到，我国西部面对的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比东部面对的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更有潜力，而且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

另一个是“民”。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富民才是根本。边民富，才能边防固。我一向认为，民族地区的发展必须包括少数民族的发展，不能离开少数民族的发展讲民族地区的发展。我们既要深入发动少数民族参与边疆的开发和建设，又要通过开发和建设，加速它们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那些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我们过去往往采取照顾的办法，他们的生活虽有保障，但失去传统的生产手段之后，没有找到靠劳动

来从事生产的新门路，容易引起精神生活的衰颓。所以说，一个民族，不论大小，要发展繁荣，就必须有一个坚定的经济基础；一个民族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其民族特点，就必须善于利用自己特有的优势来发展经济，不然的话，这个民族是要走向衰亡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发后进地区的过程中，对土著民族搞“保留地”。实际上，这是玩弄殖民主义者搞“国民动物园”的老一套。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谋求所有民族共同发展、共同繁荣，历来是马克思主义与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

如果把“兴边富民行动”往广深高三度延伸和展开，开创民族工作新局面的历史机遇，就摆到面前来了。我算得上是一名老民族工作者，建国后一段时间还有幸参与民族工作一些大的活动，在这之后，民族研究一直是下工夫下得最多的学术领域。我以为，半个世纪以来，民族工作有两次大的发展机遇。第一次机遇是新中国成立和民族地区的解放。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民族地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引导各民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民族工作的底子，不能说全部，但主要地来自于这个时期的探索与实践。这个时期堪称民族工作的黄金时期。现在，民族工作又迎来了第二次发展机遇。这就是西部大开发。这次的主要任务是发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逐步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和缩小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我相信，抓住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围绕西部大开发的大局，既继承前人，又勇于创新，既志存高远，又脚踏实地，民族工作一定能够再创新的辉煌，为全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身逢盛世太平，又看到民族工作事业后继有人，我由衷地高兴和欣慰。真诚祝愿“兴边富民行动”取得成功，祝愿民族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老来缅怀胡耀邦同志

此时此刻胡耀邦同志离开我们已足足有 10 个年头了，我到江西共青城凭吊他的墓地也已是 3 年前的事了。我自己实际年龄也已进入了九十大关。此时回顾自己坎坷的一生，到老来还能亲眼看到我们民族复兴的曙光，实在是件过去梦里都不敢企求的幸事。想到许许多多先我而去的良师益友，我怎能不珍惜我这难得的命运。一念及此，我更不能不想起我尊敬的耀邦同志了。

我总是认为，在我一生经历的转折点上如果没有耀邦同志的英明果断、力排狂澜，我们这一小撮“毛选里有名的六教授”，决不可能这样容易破冰山而重见光明的。能有今天就不应该忘记耀邦同志对我们的这段恩德。

在 1980 年以前，我应当早就认识耀邦了，但是实际上除了见面时点头握手外，并谈不到相识和相知。在我回忆中初次说得上真正交心的是在 1980 年我得到改正之后，也就是说在我获得第二次学术生命的初期，确切的日子已不记得。有一天我正在民盟中央客厅和盟内的同志们谈话，突然通知我们来了了一位不速之客，一位党中央的领导同志。见了面才知道原来是耀邦同志。他当即声明这是他一时兴起来看望大家的，想顺便谈谈。我至今还清晰记得就在这次会见时，他说了“民盟是个党外知识分子的政党。这些知识分子第一是爱国的，第二是学有专长的，第三是为人正派的”。他接着说，“我们就希望能发挥这些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我们合作，成为复兴中国的一

个力量”。这段话当时并没有用笔记下来，更没有录音，但口口相传，至今在老盟员中几乎念念不忘。

我还记得当时大家就议论开了，认为这可以说是一锤定音为民盟定了性，而且提出了民盟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应该做些什么。我们特别感到高兴的是说盟员为人正派，因为当时正盛吹“宁左勿右”的风。提出正派做人的标准正切合时宜，和当前讲正气联系起来，不是更能发人深思么？

由于我最近参加了一次统一战线理论的讨论会，我又想起了耀邦同志那次乘兴访盟这件事所表露出当时党盟间那样亲密无间的关系，使人神往。在上述的谈话中耀邦同志那样轻松、平易地表达了统战的目的和方针，更是难得。耀邦同志这样说了而且也这样做了。在这里不妨用一段我自己的经历来加以说明。

我想到的是耀邦同志在1983年11月3日看了我所写的那本《小城镇 大问题》小册子之后随手写下的一段话，后来被说是他的批示，其实是读后的一点感想，并不准备给我看的，而是为了想推荐这本小册子给党内的一些同志看。不久，当时中央统战部的负责同志看到了，特地通知我到部里去看一看，当我读到了耀邦同志写在我发表的这篇文章上的话时深受感动。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对我其后近20年的生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后来《瞭望》的编者打算出版一本《小城镇四记》，收入这篇文章时，请示了耀邦同志，同意把这一段话的一部分发表在这书的前页，得到公开。

这篇《小城镇 大问题》的文章是我在1983年9月20日在江苏家乡调查时写的，回到北京后印成了一本小册子，分发给当时全国政协的朋友们作为参考。我并不知道它怎么传到了耀邦同志的手上。后来听说，他有一次有点感冒，在家休息时无意中看了一遍，他阅毕在小册子上顺手写下了自己的感想，表达了他的真情实意。就是这点坦心置腹的话感动了我。耀邦

同志认为我的这篇文章可以给人启发。他更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虚怀若谷地说出了小城镇这件事对当时党内的许多同志还是个新问题，他自己也不过是“蜻蜓点水”偶有接触，还没有深入，因此还不忙着决策。他还用反思的口吻说，如果情况没有摸透，考虑没有成熟，“硬着头皮去干……必然成不了功”，而且会“吃苦头的”。这些话出自主持大政的领导同志之口，我认为值得作为认真负责的榜样。最后他认为这篇文章还“值得一看”，因为它可以“给人以一定的思想启迪”。

我当时并没有想到我这篇文章会到达耀邦同志的手里，也没有想到他会愿意在百忙之中把它看完，而且还要推荐给其他同志们看看。他也不可能想到他这短短几句话却打中了我这个知识分子的心，真的做到了古人所说的“人之相交，以心换心”。而且又悟到了这正是统战工作的真谛，做到了周恩来总理一再强调的要党的领导同志多交几个党外朋友。

后来我越是接近耀邦同志，越是对他更为尊敬。我感激他不仅在关键时刻给了我这一生中的第二次生命，而且以身作则地教导了我怎样做一个党的朋友：怎样用自己的专长为人民服务而乐此不倦。我愿意老来纪念耀邦去世 10 周年时，记下我这一段经历和我对他感激的心情。

2000 年 1 月

补课札记

——重温派克社会学

决心补课

1998年6月，我们趁北大100周年的东风，从国外和港台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界邀请一批当前比较活跃的学者，有些是我们的老朋友，大多是较年轻的新进，莅校讲学，形成一系列学术演讲。我们的目的是想为我们的学科打开一些窗户，建立一些流通渠道，放进一些新鲜空气。在这系列演讲结束后，接着就开办第三届“社会文化人类学高级研讨班”，想趁热打铁，让这学科的东西两头接上。在研讨班结束时，我做了一次即席发言，发挥了一通我在这一段时间里常在头脑里打转的“补课”两字。

“补课”两字是小平同志1979年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里提出来的。他是针对那些在大学里停止了有二十多年的社会学等学科而说的。“需要赶快补课”这句话，成了后来重建社会学的根据。他所说的“补课”是指这些学科应当在大学课程里“补足”，也就是恢复的意思。后来我们觉得说恢复还不如说“重建”为更妥当些，因为如果社会学按二十多年前的老样再端出来，似乎不太合适，还是根据当前形势的需要“重建”为好。

最近这段时间里在我脑子里转动的“补课”却是针对我

个人而言的。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在学术上需要好好地补补课。特别是在听了北大 100 周年期间国外学者那系列演讲之后，更觉得自己有此需要。分析一下我这种自觉的迫切心情，看来是由于这几年来，特别是这一年来，我日益觉得所处的时代变动得太大和太快了。在我参与这次系列演讲时已有所流露。我在这系列演讲里宣读的那篇《读马老师遗著〈文化动态论〉书后》里曾说，一个学者的理论总是反映他所处时代的实际。时代在变动，一个学者的理论也总是跟着在变动。我用这个观点去说明马老师怎么会提出文化动态论的原因。我一面写这篇“书后”，一面反问自己，我跟上时代没有？这一问，使自己惊醒了。

我已说过多次，“身逢盛世”。时代是对得起我的，但我却有点负了时代，我自认自己远远没有赶上时代动态的步伐。我所处的这个盛世已为我提出了多少有意义的题目，但大多我却让它们在手边滑过去了，至多也只能说掠得一点影子。人为什么总是抓不住，吃不透？关键还是在自己能力不足。能力不足是由于自己这一生里投下的工夫不够。这方面我有自知之明，总结一句是求知之心还不够迫切和踏实，常满足于浅尝而止，难逃不深不透。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悔恨也没有用。眼睛还是看前面为好。尽管自知在我前面的日子已不会太多，但不管以后的日子还有多少，当前我的脑子似乎还抵用，于是自己提出了“决心补课”。

既有了这决心，我就得抓紧落实。首先要解决的是先补哪一课。我给自己的答复是先补社会学。老实说对社会学我一直有点头痛。这话可以从 1979 年乔木同志要我带头来重建社会学那一刻说起。当时我明确地表示我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后来我还是勉为其难，即当时所谓“知难而进”。这段经过我已公